

澳洲的政黨體系與工黨前途

張和蘊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澳洲的政黨體系

(一) 政黨及政黨體系的出現

政治學者艾普斯坦 (I. D. Epstein) 說，大多數西方國家現代政黨的興起，是與人民選舉同時發生的。但也有學者指出，在澳洲並未如此。澳洲在殖民地後期，各殖民地（除西澳大利亞以外），於一八五〇年代中就採用了代議制及責任政府，實行成年男子選舉，到一八八〇年代末又實行普遍成人選舉，但這三十年的選舉及議會政治仍是一些派系和壓力團體參與，而不見政黨。直到一八九〇年，政黨才出現。澳洲工黨 (Australian Labor Party) 出現於一八九〇至九一年間，當時海運及剪羊毛工人因罷工失敗，從而說服工會尋求在議會擁有代表權而成立的。^①

其後，變化非常迅速。澳洲各殖民地於一八九〇年代已出現現代政黨體系的先驅；從各政黨的存在到一種政黨體系的支配，其發展僅花二十年。在這二十年期間，各種政黨在澳洲各殖民地及獨立（一九〇一年）後的各州及全國出現，有如萬花筒似的不停變化。工黨、自由貿易黨及保護貿易黨支配了澳洲當時的各個議會。

至一九一〇年及其後數年間，工黨與首先的自由黨已支配整個澳洲的議會及各項選舉。^②工黨與自由黨在全國及各州的七次選舉中，每次選舉共計贏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票，在南澳大利亞州及塔斯曼尼亞州除兩黨的候選人外，更無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工黨與自由黨勢均力敵的支配了聯邦及各州的議會，在其中四個議會共計獲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票，以及囊

註① Dean Jaensch, *The Australian Party System* (Sydney: George Allen & Urwin, 1983), p. 26.

註② 自由黨有前後之分，此時出現的自由黨數年後即與他黨合併成立新黨，與一九四四年由孟席斯 (Robert Gordon Menzies) 建立而持續至今的自由黨有所不同。

括三個州議會的議席。一種兩黨制已明顯地出現。^③

(二) 政黨體系早期的發展（一九一〇—一九四四年）

在澳洲政黨體系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主要政黨的消長、重整或分裂，政黨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國內外情勢等因素，都會使政黨體系受到影響，而有使其分散或破裂的危險，但澳洲兩黨制的政黨體系均能多次化險為夷。

澳洲政黨體系首次有崩解（disruption）的危險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工黨內部的團結出了問題，而引起澳洲人民的關注。一九一五年，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當選為工黨黨魁，遂即出任總理。他立刻發表聲明主張繼續作戰，並倡議徵兵。工黨的政策堅決反對徵兵，但休斯辯稱，全國政府高於政黨。他於次年舉行一項全民複決以尋求對他政策的支持，雖經一番激烈的活動，但仍以少許之差而落敗。

休斯遂即離開工黨，而與一些贊成徵兵的工黨重要幹部另組國民工黨（National Labor）。稍後，國民工黨與自由黨聯合組成國家黨（Nationalist Party），使休斯得以繼續執政數年。^④

工黨的分裂，導致它在一九一七年選舉上失利。當時，工黨黨團之內對徵兵問題的分歧，除去了贊成徵兵的新教徒之影響，而給反對徵兵的愛爾蘭天主教徒一種支配的地位。因此，政黨體系雖有危機，但並未改變已存在的兩黨，即工黨對非工黨的政黨體系。

第二次影響政黨體系有崩解危險的，為鄉村黨（Country Party）的成立，這由於非工黨陣營長期分歧的結果。農村政治團體從殖民地時期責任政府開始，就成為當時選舉和議會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像當時其他團體一樣，這些團體都是短暫的，其消長隨經濟及貿易的情況而改變。迨獨立後，非工黨的政黨與團體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合併組成自由黨，使城鄉利益相結合，但仍是短暫的。它不能永遠消除農村居民長期的怨恨，特別是小麥農民，他們認為自由黨是以城市為導向的，而引起農村地區的懷疑。因此，他們尋求在議會中有他們自己直接的代表。一九一九年全國大選，有很多農村團體參選，次年元月，眾議院中來自農村的議員組成了澳洲鄉村黨。一九二二年選舉，鄉村黨相當成功，它在當時七十五席的眾議院中獲得十四席，掌握了均勢，儘管如此，鄉村黨與國家黨組成了聯盟。^⑤

鄉村黨的出現，使非工黨的政黨分成兩個政黨，不過它們結為聯盟，雖然它們在很多問題和事件上有分歧，却聯合一致

註③ Dean Jaensch, *op. cit.*, pp. 27-28.

註④ Dean Jaensch, *op. cit.*, p. 30. See also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icropedia*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86), Vol. 1, p. 716.

註⑤ Dean Jaensch, *op. cit.*, pp. 30-31.

反對工黨，這說明兩極化的政黨體系仍然存在。

政黨體系第三次崩解的危險，發生於工黨的第二次分裂。一九二九年選舉，工黨擊敗了國家黨與鄉村黨這不穩固的聯盟。工黨雖贏得政權，但遭遇派系的難題，也面臨世界經濟恐慌。工黨的聯邦政府和新南威爾斯州總理蘭恩（J. T. Lang），在意識形態、風格及政策等方面都有衝突，以致發生悲慘的鬥爭。在此情況下，萊昂茲（Joseph Lyons）帶領一些異議人士，即工黨的右翼議員到國會中非工黨一邊，和國家黨合併組成澳洲聯合黨（United Australia Party）。同時，工黨也失去它的一些左翼份子到新的蘭恩的工黨。^⑥

一九三一年選舉時，澳洲聯合黨與鄉村黨個別從事競選活動，但兩者均堅決地反工黨。澳洲聯合黨在七十五席的眾議院中獲得三十九席，因鄉村黨拒絕繼續聯盟的提議，澳洲聯合黨就與鄉村黨分開而單獨執政。主要的衝擊又臨到工黨，它於十五年間第二次分裂，其人數大為削減，在眾議院僅餘十四席，以後十多年它不僅和澳洲聯合黨競爭，而且在各方面和蘭恩的工黨競爭。^⑦

影響政黨體系第四次崩解危機的，是由於澳洲聯合黨於一九四〇年代初的分裂。澳洲聯合黨贏得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七年的選舉，但一九三八年它內部的派系鬥爭已引起大眾的注意。澳洲聯合黨魁萊昂茲於一九四〇年去世後，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被選為黨魁。孟氏發現黨內派系幾乎已到公開背叛的程度，而且他又面臨一個敵對的鄉村黨。不久孟席斯下台並辭去黨魁職務。澳洲聯合黨迅速衰敗，至一九四二年底已名存實亡，一九四三年大選僅有十二名獲選進入國會。孟氏瞭解此種情勢的危機，他就召集澳洲聯合黨各派系和餘黨於坎培拉開會，並於一九四四年底組成了當代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情勢雖有重大的發展，但工黨對非工黨的模式沒有重大的變更。^⑧

（三）孟席斯時期的政黨體系

政黨體系第五次崩解危機，和工黨於一九五〇年代大分裂及孟席斯政府長期選舉成功有連帶關係。同時，它比任何先前的重大改變都有長期的影響，它牽連了所有的政黨而非僅工黨一黨。但它對政黨體系的影響却小。

工黨一九五五年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一九四〇年代工黨與共產黨走得太近，工黨部分人士因反對這種趨勢而另組民主工黨。

註⑥ Dean Jaensch, *o.p. cit.*, p. 31.

註⑦ Dean Jaensch, *o.p. cit.*, p. 32.

註⑧ Dean Jaensch, *o.p. cit.*, pp. 32-33.

回溯澳洲工黨於一九二四年會議時曾通過一項提議，宣布禁止共黨黨員擁有工黨黨員的資格。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孟席斯的澳洲聯合黨政府曾禁止共產黨。^⑨一九四一年柯定(John Curtin)的工黨政府取消上述禁止共產黨的法令。工黨雖否認共產黨員有工黨黨員資格，但影響進來了。到一九四五年之前，共黨在工會運動的力量已顯著的增加，共黨控制了運輸業、礦業及金屬業，並經常有共黨所授意的罷工浪潮。越來越多有勢力的工會領袖們公開敵對祁夫禮(Joseph Benedict Chifley)的工黨政府。然而，工黨贏得了一九四六年全國大選，祁夫禮從事兩方面的行動：(1)完成工黨在戰後的主要發展計畫；(2)為達成此目標，需要遏阻並根絕共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力。^⑩

祁夫禮政府在其發展計畫上成就較少，但成功地緩和共黨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力。祁夫禮命令敗壞的工會進行改革，並執行新的刑法(Crimes Act)，使一些共黨的工會領袖們下獄，凍結很多由共黨所控制的工會資金，以及動用軍隊制止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祁夫禮及其政府，事實上，是澳洲歷史上最反共的。但祁氏在論戰中失敗了。當工黨以強烈行動抵制共黨影響力時，孟席斯及自由黨却創造一著名的辭彙稱為「共黨之罐」(the Communist Can)，孟氏於一九四〇年代不斷用這辭彙形容工黨是被共黨統治的黨。工黨找不到一個方法化解這個用語的傷害，也沒有足夠政治溝通管道以回應它。再加上其他因素，以致一九四九年大選，孟席斯所領導的自由黨暨鄉村黨聯盟擊敗祁夫禮所領導的工黨而當選。^⑪

此次大選孟席斯所領導的聯盟雖然獲勝，但未完全得勢，因工黨仍繼續控制參議院，工黨不時阻撓政府的立法計畫。因此，孟席斯於一九五一年解散參眾兩院舉行大選，選舉結果，聯盟在兩院都得到確切的多數，為孟席斯政府奠定長期執政的基礎。孟氏執政達十七年之久(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其所以能長期執政，主要因素如下：

(1) 社會因素 孟席斯執政的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是澳洲空前的經濟成長和繁榮時期。經濟的成長，使財富增加並廣泛的分配財富。而物質富裕的主要影響，是使勞工階級生活改善，使他們吸收中產階級的價值並追求中產階級的理想。這種成就歸因於政府的有效領導，使孟氏能夠一再當選而執政。

同時，孟席斯政府和自由黨從澳洲國內及國際事件中製造政治資本，經常利用機會形容工黨為「危險的社會主義者」或「共黨之罐」。諸如在中共政權成立、韓戰、彼得羅夫事件、古巴危機等重大問題發生時，都曾用過類似的辭彙，並強調只有孟席斯的自由黨政府能够抵抗共黨對澳洲的威脅。^⑫

註⑨ 孟席斯擔任澳洲聯合黨黨魁時執政期甚短，他後來擔任自由黨黨魁時執政期較長。他於先後執政期間均以反共著稱。

註⑩ Dean Jaensch, *op. cit.*, p. 36.

註⑪ Dean Jaensch, *op. cit.*, p. 37.

註⑫ Dean Jaensch, *op. cit.*, p. 38.

(2) 自由黨的利益 一九六〇年以前，所有擁有投票權的澳洲人民大都支持自由黨政府。這有三項主要的因素：a、孟席斯是澳洲政治史上最技巧的戰術家，一位圓熟的政治家。他能將政治技巧與領袖魅力和一位仁慈家長的印象合而為一，以致在政治領域上未受到挑戰。b、自由黨從孟席斯所建立的結構上獲益。孟氏從一開始就強調需要一個廣大的政黨組織和更廣泛的黨員資格。自由黨有較好的資源，至少在眾多的黨員上是如此。c、孟席斯政府在執政時期獲得相當大的利益。它善於管理經濟，使選民獲益。它的表現是活躍而積極的，在野的工黨難免給人有不活躍而消極的印象。再者，它能選擇合適選舉時間以獲得最大的利益。¹³

(3) 工黨的不利 工黨從未培養一位能與孟席斯相比的領袖。當勞工階級人數下降時，它仍宣稱它以勞工階級為基礎與導向，因此，人們認為它是一個在經濟富裕時期的工會政黨。由於領導人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它似乎永遠處於一種派系鬥爭的狀態。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工黨第三次分裂影響最為嚴重和深遠。由於民主工黨的出現，侵蝕了選民對工黨的支持。民主工黨存在的原因，就是使工黨不得掌權，但它拒絕和自由黨暨鄉村黨政府結盟，它顯然是政黨體系中反工黨集團的一份子，但其勢力不强故未能促成不同的政黨體系。¹⁴

(四) 迅速改變的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五年）

孟席斯時期，無論在選舉、立法及政策等方面都相當穩定，但接續他退休後的十年却有空前的改變。在這十年期間，自由黨至少更換了四位黨魁，他們分別是：荷特 (Harold E. Holt)、高登 (John G. Gordon)、麥馬洪 (William McMahon) 及斯耐登 (Bill Snedden)。自由黨暨鄉村黨聯盟長期執政之後，於一九七二年大選落敗而失去政權。解釋這些改變，部分原因是自由黨統治基礎的改變。

孟席斯時期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於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已開始脆弱，戰後的繁榮於一九七〇年代初顯然已經消失，通貨膨脹及失業率相繼增加。人們對自由黨是個完全就業、富裕及繁榮的供應者的印象，至此不免發生疑問。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由於經濟衰退，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福利、醫療服務、教育及城市等問題，都逐漸引起注意，所有這些問題都曾在孟席斯當政時期出現，但由於當時富裕的景象，而被人們忽視。¹⁵

註¹³ Dean Jaensch, *op. cit.*, pp. 38~39.

註¹⁴ 民主工黨反對工黨的角色，從一九五八年以後逐漸下降，至一九八〇年實際上已經消失。

註¹⁵ Dean Jaensch, *op. cit.*, p. 41.

尤其是，自由黨本身失去團結，而使其利益受損。從荷特去世之後，自由黨一直為派系鬥爭而擾攘不安，以及黨內人士更迭由高登、麥馬洪而斯耐登的起起伏伏。自由黨的重要組織及方針，曾對孟席斯在選舉及政策上有很大的價值，都開始衰落了。當派系鬥爭和領導人大權旁落時，以致各州非工黨領袖們都變得更有權力和主張。此種情形，使曾經是團結的政黨陷於分裂。

相反地，此時工黨的情況却有顯著的不同。工黨黨魁惠特蘭(Edward Gough Whitlam)，頗具魅力，他使工黨的形象刷新，團結組織、強調國內問題，終於獲得一九七二年大選的勝利。^⑮

惠特蘭執政後，工黨在眾議院雖佔多數；但在野的自由黨暨鄉村黨聯盟因小黨民主工黨對聯盟的支持，而控制了參議院的多數。因此，當惠特蘭在職期間，他的立法計畫經常遭受挫折。(按澳洲憲法，參院有權阻止來自眾院的議案)，在聯邦六個州中，有四個州政府為非工黨政權。惠特蘭的社會主義與中央集權政策，企圖犧牲各州的權利而增加它本身的力量，但遭受相當的阻力。

在澳洲政治史上，一九七五年可以說是多事的一年，先是惠特蘭政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凱恩斯(James Cairns)與礦物暨能源部長康諾(Rex Connor)，企圖蒙蔽國會，以非官方的途徑籌措海外貸款，事洩後，引起軒然大波，二人也因之先後去職。再者，惠特蘭在施政上的缺失，加上經濟困難重重，使其政府陷入困境。反對黨自由黨黨魁傅雷澤(Malcolm Fraser)認為機會難得，決定利用參議院的多數以擱置預算案，迫使工黨政府解散國會，重新大選。預算案一再被擱置，使得政府的經費發生問題。但惠特蘭繼續戀棧，不向壓力屈服，以致危機日趨嚴重，這年十一月，澳洲總督約翰·克爾爵士(Sir John Kerr)遂使用「保留權」(reserve power)將總理惠特蘭免職，並任命傅雷澤為看守內閣總理，以預備大選。^⑯孟席斯之後的十年變化很大，自由黨頓失強人領導，以致步調紊亂，顯出由盛而衰的現象。工黨黨魁惠特蘭執政僅短短的三年，由財經危機而觸發憲政危機。但兩黨形式的政黨體系並未因之而改變。

(五) 從傅雷澤到霍克(一九七五)

傅雷澤領導的聯盟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大選中擊敗惠特蘭所領導的工黨，贏得壓倒性的勝利。在競選期間，工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除言辭攻訐外，並向傅雷澤投寄炸彈郵包，又多次示威攻擊傅氏。但傅雷澤一直表現他是位堅強而勇敢的人，留給人深刻印象的演說者和思想家。工黨的慘敗，它至少獲得兩個教訓：(1)澳洲工黨不能以它代表左翼意識形態的空論家來

^⑮ Dean Jaensch, *op. cit.*, pp. 41-42.

^⑯ 張和蘊，「澳洲政情及其動向」，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三期(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頁七八。

治理澳洲，並且它不能忽視公眾生活的莊嚴；(2)參議院在政治上是有權力的，各州希望維持這個權力，而惠特蘭公然反抗這些事實，是行不通的。¹⁹

傅雷澤掌權後，他儘量吸引外國投資，開發資源，並竭力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開支，及整頓若干福利計畫，以減少政府的巨大赤字。傅雷澤又決定讓澳洲人民來醫治自己的「英國病」，那種病包括強大的工會勢力和罷工癖，傅氏指出，若干兇狠好鬥的工會行動是一種破壞的力量。他曾提出口號：「誰來統治國家？政府還是工會？」因此，多數人民都贊成嚴格的工業立法。

此外，傅雷澤重視優秀人才的培養。傅氏強調，對那些有工作意願的人來說，澳洲是個「自由和機會的樂土」。他的中心哲學思想是工作道德、自求進步與自助人助。¹⁹

傅雷澤執政七年四個月，他的政績雖有若干成功之點，但導致他後來挫敗的因素，主要仍是嚴重的經濟問題，這種經濟難題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澳洲國內因素形成的，一方面也受了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尤以後者為最。

一九八三年三月澳洲大選中，霍克(Bob Hawke)所領導的工黨擊敗了傅雷澤所領導的自由黨暨國民黨聯盟，²⁰於是由此霍克繼任總理。其後工黨又於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七年及一九九〇年大選獲勝，使霍克連續執政至今八年有餘，他成為僅次於前自由黨總理孟席斯之後，第二位任期最長的總理。

霍克和澳洲工會的關係淵源很深，他曾任澳洲工會理事會(ACTU)的主席達十一年之久(一九七〇—一九八〇)，這種關係對他以後從政有很多方便和幫助。霍克於第一任上台之前，曾召開黨大會，並與澳洲工會理事會締結「物價與所得協定」(Prices and incomes accord)，這一協定為霍克的統治基礎，使得頻繁的罷工為之減少。霍克到任後不久，更召集全國經濟高峰會議，使政府、業主與工會之間達成共識，都承諾和諧工作。一九九〇年大選之前，霍克政府又和工會理事會締結「工資、租稅協議」(The wage-tax deal)，根據這項協議，一般薪資收入者，每週獲得相當於加薪或減稅的五十澳元特別津貼，以維持勞資關係的和諧。²¹

霍克的作風明快而具有彈性，他採用了實用主義與穩健的路線。他自一九八三年首任以來，就放下工黨政治思想的術語和老套，而以穩健的態度進行經濟改革。但他執政以來，由於其政府管理上的缺失及國內外因素的影響，並未把經濟治理得

註⑱ Editorial, "Judgment Day for Austral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2, 1975, p. 2; *The Times*, Dec. 15, 1975.

註⑲ 張和蘊，「從大選結果看澳洲政府動向」，問題與研究，第廿卷第三期(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頁六一。

註⑳ 國民黨的前身為鄉村黨，一九八二年改為今名。

註㉑ 張和蘊，「澳洲聯邦選舉及其外交政策」，問題與研究，第廿九卷第十期(民國七十九年七月)，頁五一—五二。

好，以致外債多、利率高、失業者衆。目前工黨因領導權問題又陷於內訌，對其政治前途實爲不利，而自由黨也正利用機會培養實力，以備東山再起。

這期間，澳洲國內外情勢有若干變化，工黨與自由黨暨國民黨聯盟互動的方式也與以往不盡相同，但其原有的政黨體系仍未受到多大的影響。

二、澳洲工黨的前途

澳洲執政黨工黨的領導階層，於今（一九九一）年五、六月間發生內訌，以致使工黨陷於嚴重分裂，其後餘波盪漾，這對工黨的前途將有深遠的影響。

這場內訌起因於工黨黨魁霍克（Bob Hawke）和他的副手基亭（Paul Keating）有關領導權之爭，此爲澳洲近代政治史上二名重要人物之間的對決。當時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基亭，於五月三十日向總理霍克提出挑戰，理由是霍克未履行他二人就領導權轉移的協議。^②雙方都爲此發生激烈的爭執。

工黨的一百一十名國會議員於六月三日舉行黨團會議，進行投票，結果六十六票對四十四票支持霍克留任黨魁，而挑戰未成的基亭立即辭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職務，成爲後座議員。基亭並且誓言，他不會再有領導權的挑戰。^③

其後，霍克說，他對於基亭的表示感到滿意，形容他以廿二票的優勢獲勝，是黨團明確的裁決，他應該留任黨魁到下次大選，霍克又說，下次大選只有他來領導才能獲勝。

但基亭的支持者，包括若干資深的內閣部長，立刻對選舉霍克的合法性提出異議，並形容這項投票是領導權戲劇的「第一幕」（“Act I” of the leadership drama），它使工黨陷於深淵。他們攻擊的焦點有二：（1）左派三十二位成員中，有廿九位投給霍克，是在左派對其成員監控之下才獲得的；（2）九名來自昆士蘭州的右派人士受到某種壓力，如果他們之中任何人投給基亭，將失去他們在黨內初選的機會。在此威脅之下才投給霍克的。^④

註② 這項協議，是霍克和基亭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間達成的，其內容爲：如果工黨贏得一九九〇年大選，霍克將辭去黨魁職務，讓基亭繼承。但自那次大選獲勝後，霍克遲遲不肯將領導權交出，並且片面取消協議，因此引起基亭向他的挑戰。See Paul Kelly, “Friend, Feuds and Foes - Inside the secret deal,”

The Weekend Australian, Jun. 8-9, 1991, pp. 23-25.

註③ 但人們推測，基亭可能會東山再起。See Glenn Milne, “Hawke wins round one,”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p. 1-2.

註④ *Ibid.*

基亭陣營表示，如果左派被允許自由投票以及昆州國會議員不被脅迫的話，基亭可以得到五十三票，而霍克則得五十七票，這種結果可能迫使霍克辭職。

基亭的支持者堅定地說，他們將遵守基亭「不再挑戰」的誓言。他們的策略是利用工黨正面臨的現實，即霍克政府沒有了基亭，它就失去了用來攻擊反對黨的最有效武器。這策略的目的是，使霍克在憑自己表現來領導政府的情況下，倍增壓力，然後使霍克了解他不能贏得下次選舉而自願退休。²⁵

這項投票使霍克幾乎完全依靠左派的支持以維持他的領導，此將影響霍克政府的政策方向。霍克是和左派達成協議之後才獲得支持的，因此，左派資深部長何奧（Brian Howe）被選為工黨的副黨魁。隨後內閣進行改組，何奧擔任副總理兼社區服務暨衛生部長；原任初級產業暨能源部長的克倫（John Kerin）被任命為財政部長。²⁶

霍克雖然獲勝，但看起來他好像是個政壇上的失敗者。霍克面對一個軟弱而分裂的政府；他依賴工黨左派的支持，這種政治的依存將使左派在政策及策略上有更強的影響力。事實上，霍克與基亭之間有關領導權問題並未解決，其情勢已經很清楚，六月三日工黨黨團會議舉行之後，一些投給霍克的黨團成員都說基亭不久將獲勝為工黨黨魁。²⁷

基亭和他的主要支持者理查遜參議員（Sen. Graham Richardson）都認為，工黨將受不了另一次挑戰。霍克繼續作總理必須依靠他自己如何掌握，即依靠他領導的方向和凝聚力。霍克背負一個巨大的重擔，一個新的副手，一個新的財長和一個新的權力基礎。

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一篇社論中指出，霍克勝利後的表現未如人意，是由於他未提出適當的主張；他沒有為澳洲前途提出一個最清楚的意象；他沒有為新的政策宣佈最具發展的計畫；他沒有為挽救經濟衰退而提出堅強的觀念；他沒有宣佈恢復樂觀的正確途徑。他雖重申他是領導澳洲工黨贏得下次大選的最佳人選，但他沒有宣稱他是治理這個國家的最佳人選。²⁸

一個領袖能博得尊敬而獲得支持與他以滿足支持者的希求而收買支持大不相同。當下次大選逐漸接近，霍克將發現愈來愈難以為棘手的決定、不受歡迎的決定作辯護。政府陣容因基亭的離開而減弱，它已失去一個最能推銷觀念的人，因此無法

註²⁵ *Ibid.*

註²⁶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 3. 克倫屬於右派，他與霍克妥協，未出馬競選副黨魁，而保住了霍克與左派之間的協議，即讓左派資深部長何奧出任副黨魁。

註²⁷ Paul Kelly, "Labor comes out of it with no heart... or firepower,"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p. 1~2.

註²⁸ Editorial, "Hawke takes refuge in populism,"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 12.

將令人不愉快的決定轉換成讓人接受的決定。

霍克執政過於遷就權宜，而少原則。霍克的重要任務，是以堅強的意志力和方向感來鞏固其政府。基亭正在後座運用他的時間，等候霍克的失誤或滑跌，而給他另一次挑戰的機會。²⁹同時，在野的自由黨也虎視眈眈，蓄勢待發，以備重掌政權。因此，這種趨勢，為工黨的前途增添變數。

澳洲工黨堪稱澳洲一大政黨。它成立最早，黨員遍及勞工大眾及工會，基礎相當深厚，故以往它雖歷經三次分裂的危機，而能存在至今。但其分裂的後果，不是失去政權，就是長期在野。這種教訓，它應該記憶猶新。因此，工黨的前途主要繫於黨內今後能否化解紛爭與促進團結。

三、結語

澳洲各主要政黨的黨魁，通稱該黨聯邦議會（國會）的領導人（Fed. Parl. Leader），是由該黨的國會黨團選舉產生。按照慣例，多數黨的黨魁，奉總督召見，組閣成立政府。黨魁一職，並無固定的任期，其領導權轉移亦無一定的方式。因此黨魁的更迭，通常是由於黨魁退休或因故辭職（如在大選中落敗），使其職位出缺，即由該黨黨團選舉新人繼任。如果某黨魁的副手才華出眾，足以領導群倫，自然為明顯的繼承人，而由黨團選出。再者，如果某黨魁戀棧，他的副手或其他同事得以向他的領導權挑戰，而由黨團投票決定黨魁職位屬誰。澳洲工黨目前領導權之爭，即為後者。

再者，就政黨體系的主要類型而言，從政黨的數目來作政黨體系的分類，並無多大的意義，且容易產生誤導作用。但如果我們加上政黨競爭的情況和競爭者的相對勢力兩個變項，所獲的政黨體系的分類圖，就既明確而又具意義了。³⁰照上述原則分析，澳洲的政黨體系可算為兩黨制。雖然澳洲多年來有類似於第三小黨的鄉村黨（現稱國民黨）存在，但它自成立以來，就與非工黨的大黨結為聯盟共同問政或執政，以致形成工黨與非工黨二相對勢力競爭的局面。這與英、美兩國的情形稍異，似為兩黨制的一個特例。因此，決定這種政黨形態的重要因素，除選舉法規、社會結構和文化兩項外，更受政黨體系的歷史背景之影響。

澳洲政黨體系是個範例，它表現出傳統的智慧，大部分的政治制度因而建立，因此很難說這些政治制度是某人或某團體的產物。澳洲的政黨政治已走向制度化，是英國文化在海外的分支，也充分體現了民主政治的文化精髓。

註29 Editorial, "Politics of expediency, desperation and fears,"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 12. 不過，基亭不宜在後座停留太久，否則，其政治生命將

註30 因失去職務而逐漸損壞，那是基亭的難題。See Paul Kelly, "Labor comes out of it with no heart... or firepower," *The Australian*, Jun. 4, 1991, p. 2. 江炳倫，「政黨與政黨體系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二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八十年三月），頁一二五。